

# 爱国学者姚名达生平及其史学思想

王咨臣

姚名达，字达人，乳名侠生，号显微。公元一九〇五年（清光绪三十一年）乙巳三月二十三日（农历二月十八日）出生于江西兴国县南门外竹坝村。父亲姚舜生，是一位前清秀才，做过中、小学教员和县政府秘书、科长。母亲徐才琳勤劳善良。家里只有几亩薄田，但有几百部经、史、子、集古书。名达六岁，父亲便开始教他识字读书，八岁入塾学习。课暇并爱读《三国演义》等小说。不久，因感小说内容颇多虚构，不如史籍真实，故转而对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，奠定了毕生研究史学、目录学的思想基础。

十岁，从父亲读书兴国达德学堂，课暇始读《纲鉴易知录》。由于他精读的结果，深切了解到书中陈义的浅薄，褒贬的失当，搜罗不广，考证不精。对于错误地方，他便随时加以眉批进行批驳，形成了名达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家中所藏历史书籍比较多，他便拿出来一一对照校勘，竟发现年代不同、史实差异的地方很多，不知谁是谁非，心中发生许为疑难问题，无从解决。后来，专门编著了《史学家年谱》、《史学年表》、《中外历史大事年表》等书。

名达小时候除喜读历史书籍外，还爱好钻研地理书籍并喜自绘中外地图，研究山川形势，设想社会的未来改革与建设，设想战争爆发时，何处宜攻？何处宜守？假借兵马，驰骋图上，作战

斗游戏。对通都、僻壤的地名，心中无不熟悉。

名达在达德学堂毕业后，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便考入江西省立赣县中学肄业，见闻益广，成绩斐然。五年后毕业，因家境清贫，父亲命他辍读学医，使可自立谋生，且能济世。名达虽勉强从命，但内心却郁郁不乐。不久，名达友人中有察知他不愿学医，便告知他：“上海南洋公学，设有国学专修科，可能符合你的心愿，你何不前往就读呢？”名达听了以后，不禁狂喜。遂毅然弃医前往上海，考入了南洋公学国学专修科肄业。

一九二五年二月，北京清华大学开设有中国历史、哲学、文学、语言及文字学等专门学科。名达闻讯，便欣然应考。结果第一届研究生共考取三十八人，除姚名达外，还有王力、刘盼燧、刘节、高亨、谢国祯、吴其昌、周传儒、朱芳圃、徐中舒、姜亮夫等。后来这些人在中国史学、语言文字学等方面，都有较大的成就和贡献。

名达考入清华研究院后，便拜梁启超先生为导师。梁先生见他年龄最小，又能笃志力学，十分喜爱。因问他意趣如何？名达答道：“愿下极大决心，立志以十年功力，作《中国史学史》的专题研究。非待是书著成以后，当不离开清华一步！”梁先生认为其志可嘉，遂乐为指导。名达亦尝问梁先生：“先生近自患学问欲太多，而欲集中精力于一点，此一点是什么？”梁先生说：“史学！史学！”梁启超对名达十分器重，有“后生可畏”之感。尝致书名达说：“余之所以愧为师者，亦惟增一日之长耳？”名达对梁先生亦极爱戴，师生间情谊至深且厚。

梁先生当时所讲的课程有：《中国文化史》、《儒家哲学》、《历史研究法》、《历史研究法补编》、《古书真伪及其年代》等，其中有许多且系名达与同学周传儒等人笔记整理而成的。并拟师生通力合作，共撰一部空前的巨著《中国文化史》。

名达自己所研究的《中国史学史》专题，内容极为广泛，着手并非易事。于是在专题之内，又先开始从事《章实斋的史学》

的研究，买浙本，借刘本，进行精读理解，共费去一学期的时间。第二年，再读《章氏遗书》，所得史料更多。凡胡适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所没有的，便一一随时进行订补。是为名达后来订补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作了准备。

名达为了深入了解章实斋（学诚）学术思想的渊源，又撰写《邵念鲁年谱》《朱筠年谱》二书以进行探索。邵氏为实斋根底所自出，朱氏又为实斋史学讨论修饰所从得。名达认为读古人书，如不日夜寻绎，溯其渊源，便不能融会贯通，实非治学所宜。《邵念鲁年谱》有表有图，分谱前，谱后。其体例实为名达所首创，其内容重谱主的个性，志趣，行为，思想，境遇，家学，师传，友箴、著作等，分条别载，低格缮写，眉目了然，其见解实又为其所独到。

由于导师梁先生的循循善诱，为学益坚。按照研究院章程规定，一年应行毕业，授予证书。但名达不忍离开导师，更不愿抛弃自己的专题。于是，毕业后继续留做研究工作，改编刘翰怡所刻《章氏遗书》，且考出有年、月章氏著作达一半以上，编为《章实斋先生著作年表》。《章氏遗书》，仅费时月余，采用新的分类方法改编而成，梁先生见后，大加赞赏，拟交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行世，以广流传。但名达因感仍有未妥之处，不欲草草问世。嗣后岁月因循，卒致未有刊印，今稿本亦已散佚，殊属史学界一大损失。

是时名达著述计划十分宏大，拟撰写下列各种丛书。

一、《中国史学丛书》十二种：〈1〉《中国史学史》，一名《史学通史》；〈2〉《中国史学年表》；〈3〉《中国史书所知表》；〈4〉《中国史学家列传》；附《史学家所知表》；〈5〉《中国史学家论文集》，一名《史学论丛》、《中国史学家论文总集》；〈6〉《中国史书目录》；〈7〉《史学溯源》，一名《史学的起源》；〈8〉《史官制度考》一名

《史官制度史》；〈9〉《方志学史》；〈10〉《传记学史》；〈11〉《史书要籍解题》；〈12〉《史籍通考》。

二、《史家传谱丛书》十一种，大都已撰写成书：〈1〉《刘知几年谱》；拟撰，未果；〈2〉《程伊川年谱》，已由商务铅印行世；〈3〉《吕祖谦年谱》，已成而未印行，稿本今佚；〈4〉《宋濂年谱》，已成，毁于“一二八”国难；〈5〉《刘宗周年谱》，已由商务铅印行世；〈6〉《黄宗羲年谱》，已成，毁于“一二八”国难；〈7〉《邵念鲁年谱》，已由商务铅印行世；〈8〉《朱筠年谱》，已由商务铅印行世；〈9〉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，已由商务铅印行世；〈10〉《万斯同年谱》，未成；〈11〉《梁启超年谱》，未成；

这种丛书，为名达研究的巨大工程。凡对于史学有所发明，或对于研究历史的方法有所贡献，或对于史学有巨大著作的史学家，皆撰著年谱以记述他们的生平和史学思想

三、《史法学丛书》二十一种，大都未有成书，现列目如下：〈1〉《史学原理》；〈2〉《史料搜集学》；〈3〉《史料考证学》；〈4〉《辨伪学》；〈5〉《史料统计学》；〈6〉《史料图表学》；〈7〉《史通评注》；〈8〉《新编文史通义评注》；〈9〉《史书著作学》；〈10〉《年谱学》；〈11〉《传状学》；〈12〉《书志学》；〈13〉《方志学》；〈14〉《记事学》；〈15〉《家谱学》；〈16〉《史书的地理研究法》；〈17〉《史书目录学》；〈18〉《刘知几史学》；〈19〉《章实斋史学》；〈20〉《史学与报学》；〈21〉《史地知识与青年》；

一九二八年春，名达虽因导师王国维先生去世，梁启超先生因病离校，感到问学无津，但他仍坚持居住清华研究院，继续研究《中国史学史》的专题，先后写成《章实斋年谱补正》、《章实斋著述考》。因《文史通义》版本不一，错误丛生，遂致搁笔

未能终篇。

六月十四日，名达肄业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又已三年期满，经由校长温应星，导师梁启超、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李济、林宰平诸先生审核成绩，认为合格，特授毕业证书，以资证明。这虽是名达第三次毕业，但他仍继续从事于史学史的研究工作。并于八、九月间南下，访求《章代遗书》钞本及有关资料。询至章学诚先生老家，阅读《章氏宗谱》、摄得章学诚夫妇遗像，抄得宗谱中许多外间不易见到的史料，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。十九日到达上海，遇见胡适，谈及订补《章学诚先生年谱》事，商定了订补的计划。名达遂以第二次所撰《章实斋年谱补正》为蓝本，将新增补的史料插入原文，与胡适所撰的原谱合为一书，是为名达第三次所撰《章实斋先生年谱》。书前还应胡适的请求写了一篇长序。序文主要说明三点：一是怎样研究章实斋的；二是对胡适《章实斋年谱》的意见；三是怎样代胡适增补这本年谱。此谱后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行世，列为《中国史学丛书》、及《万有文库国学小丛书》，甚得史学界的好评。

此外名达还写成《成吉思汗》、《郑和》、《中国文化小史》三书，也都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，列为《小学生文库丛书》。

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九日，梁启先生因长期患病，医治无效逝世，终年五十七岁。名达深感悲恸，无法再留清华研究院，遂应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聘请，于三月五日启程南下，就任编辑兼特约撰述，携同家人居住宝山路祥瑞十三号，自号书室曰“史斋”，藏有许多重要的史籍。

上海商务印书馆是晚清时代张元济诸先生经营起来的，编印出版了许多新书，同时还附有东方图书馆，馆内藏有许多善本古籍。名达除办公时间外，每天清晨、午夜、仍继续从事《中国史学史》的研究，并遍读馆中所藏的善本古籍和所印的新书。这些古籍，有许多系馆中编印《涵芬楼秘籍》及《四部丛刊》的底本。

四月一日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总编纂王云五，分编纂何炳松、姚名达、段育华，高卓等十二人，为了继承《四部丛刊》大业，帮助全国各县市、各中小学校建立图书馆，特又编印《万有文库》第一集一千种、分订二千册。内分《国学基本丛书》一百种、《汉译世界名著》一百种、《学生国学丛书》六十种、《国学小丛书》六十种、《新时代史地丛书》八十种、《百科小丛书》三百种、《农业小丛书》五十种、《工业小丛书》六十五种、《商学小丛书》五十种、《师范小丛书》六十种、《算学小丛书》三十种、《医学小丛书》三十种、《体育小丛书》十五种等。除收入古籍外，并约请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撰写文稿，名达亦为撰《目录学》（按此书属于《国学小丛书》），列为第一种。后来又编印《万有文库》第二集七百种，编纂人员多有变更和增加，笔者友人杨家骆亦被延聘为编纂。

一九三二年，“一、二八”战役中，日本的炮火，竟将负有世界盛名的上海商务印书馆炸毁。名达所著宋濂、刘宗周、黄宗羲、邵廷采（念鲁）、朱筠，章学诚诸人年谱，当时度于编译所的铁箱中，以备排印。炮火过后检点铁箱，发现铁箱多被熔化，宋濂、黄宗羲二谱被毁。但度《刘宗周年谱》的铁箱独存。名达的祥瑞里十三号寓庐亦被炸毁，所撰《目录学》、《中国目录学史》、《中国目录学年表》旧稿，均全部化为灰烬。更使名达痛心的事，即为他多年来研究《中国史学史》专题所摘录的资料卡片十余万张，其中且有他思想见解独到的记载，有前人所未有发现的珍贵史料。除自己著作和卡片外，还有几万卷珍贵的史籍，亦片纸无存。至于东方图书馆所藏一百多万卷古籍和善本书，亦同时遭受焚毁，这给名达研究《中国史学史》的专题带来了一定的困难。还有名达的家私财物，损失亦不下数万元。是为名达家业的第二次被毁。故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，最为痛心疾首。但他并没有被吓倒，相反却变得更坚强了。他曾愤怒地说：“他们

毁灭我们的文化，我们应该怎样地发扬我们的文化，给他们瞧瞧，使他们知道我们是打不倒，灭不掉的！”（见姚名达《目录学·自序》）这充分表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主义的自立精神。当时名达兼教复旦大学。因江湾亦遭日军袭击，名达遂率领学生转入租界，积极鼓吹抗战，襄助校方组织义勇队，准备参加战斗！后因接受某旅长的劝告，遂在某旅担任运输工作。曾向法租界各地劝募，所募得的鸡肉罐头及日用品甚多；每日用汽车运往前方劳军。士卒欢呼，军心大振。复旦大学义勇队人数虽少，但贡献颇多。

沪战结束后，名达扫净了炮火冲击起的尘土，重新购置图书数千卷，庋藏于自己的“新史斋”中。补苴《刘宗周年谱》，重撰《目录学》。名达与杨家骆等人所编纂的《万有文库》，得到大量印行。流传既广，获利也多。但总编纂王云五、对分编纂人员十分苛刻，待遇微薄。于是名达与杨家骆相继辞职，各自独立门户，自办书店。杨家骆返回老家金陵，创办“中国辞典馆”，专事编辑各种辞典。先后铅印行世者有《图书年鉴》、《历代经籍志》、《中国丛书大辞典》、《四库大辞典》、《民国名人图鉴》、《唐诗笺注》等十余种。解放前夕，杨家骆随世界社李石曾赴台湾，主编《中国学术类编》丛书，共二千余册。据杨家骆于一九八一年来信与笔者说，已由台北鼎文书局印行了七百余册。

名达当时仍留上海，租得霞飞路五二三号店肆一栋，创办女子书店，专事编印《女子月刊》和《女子文库》，以尊重妇女权利，提高妇女地位为职志。原配夫人黄心勉任主编，但因黄是家庭妇女，识字不多，故实际上书刊的编辑，校对、发行等工作，都由名达一手包办。

一九三六年七月，左翼作家钱杏邨（阿英）为了党要办好一个妇女刊物，占领文艺阵地，便派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生凤子来主编《女子月刊》，并指示她说：“要把刊物办活，为我所用。必须

组织各方面的人写稿，成为我们党的一个宣传阵地，这也是党的目的！”凤子接受任务后，便由复旦大学文学系主任谢六逸介绍凤子前来女子书店办《女子月刊》。名达十分欢迎，便将编辑工作全部交给了凤子。凤子向名达提出请客的建议，客人都是各大学文、史系的教授和文学作家。名达非常高兴，向客人说明了创办《女子月刊》的目的和意义，并介绍主编凤子与大家见面。复旦大学谢六逸、赵景深两位教授都讲了话，带头表示支持这个刊物。实际上全力支持的是钱杏邨同志。

以凤子名义主编的《女子月刊》第一期，主要撰稿人有周起应，华汉及田汉等。周起应即是周扬、华汉即是阳翰笙。当时正是党中央提出联蒋抗日的时期，也正是在两个口号之争以后。钱杏邨同志执行当时上海党组织的指示，占领刊物这个阵地，开展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工作。他们之所以如此积极地为《女子月刊》擘划，协助凤子编好《女子月刊》，是从革命工作需要出发的。

当时名达正是党的统战对象，他参加上海文化界的爱国运动极为活跃。一九三五年五月，他与上海一百五十多名文化界人士，联名发表《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》，反对埋头读经，反对复古运动，唤起民众，“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”。（见《读书与生活》1935年六月第2号）。十一月，名达又与上海三百多个文化界人士一起联名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。《宣言》说：“负有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……应当立即奋起，站在民众的前面领导救国运动。”中华民族“应该进一步觉醒，早日奋起，更有效的保存民族正气，争取民族解放”。（见《大众生活》1935年12月第1卷第6期）。

此时名达除积极参加爱国运动外，还接受了上海商务印书的约请，为《中国文化史丛书》第二辑重撰《中国目录学史》一书。每趁课暇，辄走京、沪、杭各大图书馆，博访精考史料。后竟自上海移家杭州，专事查阅浙江图书馆的藏书。开始还兼任上海复

且大学教职，后来连教职也辞去了，遂致全家生活十分困难，瓶粟屡空，他也不顾，专事著述。这是名达第三次撰写《中国目录学史》，历时八个月，始克成书。当开始撰写时，本欲博搜精考，写成毫无遗漏的文献史，故逐书考察它的内容，逐事确定它的年代，逐人记述他的生平，依照时代的先后叙述有系统的东西。撰写过半，才知道这样做的规模太大，不是定期出版的预约书所宜有。于是名达又立即毁弃已成的原稿，改用主题分篇的方法，撮取大纲，混合编制。经过几次的修改，遂分为叙论、溯源、分类、体质、校仇、史志、宗教目录、专科目录、特种目录、结论诸篇，比较详细地记述了自古至抗战前夕中国目录学的发展，源流毕具，一览无遗。最后，名达还提出了许多目录学理论方面的创见和希望。如认为中国古代目录学之最大特色为重分类而轻编目，有解题而无引得，分类未能以学术分类为基础，不能反映图书内容的本质。所以他希望提倡主题目录，主张精撰解题、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，统一全国目录学的方法，使治书之业、寻书之法、易学易做，使目录学成为人们所共知的最通俗的常识。他还主张丛书必须拆开，不应合入总类。文集如不作分析目录则宜改入总类，这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见。有人认为“这本书搜罗之博、体例之善，考订之精，堪称国内目录学界的代表作。在过去几十年里，中国目录学史方面的论文专著不下二、三十种、无出其右者。”（见卢贤中《论姚名达的目录学理论》，载《江西师范学院学报》，1982年第1期。）

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。此书虽有许多独到的见解，但也有不足之处。名达在自序中即说：“是书绝非成熟之作。”一九四一年八月，他介绍笔者任国立中正大学研究部研究员时，即以此书相赠，要笔者增补原理、通记、藏书目录三篇，并以订正书中的错误相嘱。但岁月因循，未能实现，有负故人，殊深惭愧。到一九五六年七月，目录学家王重民同志为此书作了校阅重版，修正

了错误一百零六处，解决了六个保留问题。使人感到快慰无已。不过，王重民同志既没有增补上面所说的三篇，书中的错误也没有得到全部的订正。为重印版387页“安饶锷宗颐撰《潮洲艺文志》”，应作“潮安、饶锷及其子宗颐”。同页：“如张菊生先生之于海宁”，“海宁”应作“海盐”。

总之，此书缺点是次要的，优点是主要的。近年来，北京大学和南京大学图书馆系毕业学生，多有以姚名达目录学思想为选题，写成毕业论文的！足见名达目录学思想影响的深远。

《中国目录学史》是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一日写成的，但在七月七日，日本军国主义者便燃起芦沟桥事变的战火，中国开展了全面抗战。不久，平、津、宁、沪相继沦陷，名达不得不忍痛抛弃女子书店的文化事业，奉母亲、携妻女回到江西，先后居住兴国、赣州、武宁等地，继续研究《中国史学史》，撰写《史官制度史》、《史观史》、《作史方法史》、《史书体例史》、《史学的起源》、《佛家史学史》诸书。

一九四〇年九月，江西筹办的国立中正大学，在泰和杏岭正式招生上课，第一任校长胡先骕博士，闻名达对史学有高深的造诣，遂聘为文法学院文史系教授兼导师，为学生讲授《国史综析》（即《中国通史》课程）。讲稿有许多特点：〈一〉教材不分时代，综合古今，一气观察；〈二〉题目各有专名，集中一事；〈三〉使学生明了民族的盛衰，民权的伸缩，民生的荣枯。但求意识的正确深刻，不重琐事的记忆。教学方法是：先印史料，以供学生参考，后印研究大纲，以便矫正学生的笔记。这种教学方法，虽属名达尝试的创举，但已得成功，学生无不喜爱。当时他订立了教学、著书、待人手则九条，以便自我检查：

〈一〉、自早四时到六时，利用电灯，切实著书，绝对不得浪费；〈二〉、早六时登山，须成习惯，临睡跑步，尤宜实行；〈三〉、白昼除上课、进餐及午睡外，完全用于著书；〈四〉、

回信以一纸为原则，极力从速；〈五〉、不殷勤招待宾客，不访友，非要事不入城市；〈六〉、力戒攻讦、讽刺、诽议及洩漏机密；〈七〉、处处节省，除进餐，饮牛奶、洗衣、理发、款客便饭、寄信、买书籍、杂志、报纸外，其余均须节省；〈八〉、贯注精神，力求讲演及讲义的完善；〈九〉、不以位低、禄薄、势弱为怀，自己有自己前途，不籍人提携，也不与人计较。

由上述手则来看，可以知道他处世的严肃，著作的勤奋，教学的认真，待人的诚恳；足可为人师表。尤以尚节俭，戒诽议、不以位低奉薄为怀，自己创造自己的前途，而不钻营奔走为难能可贵。

名达除教课外，还积极参加校内外各种学术活动。如为中国工程师学会江西分会讲演“大禹治水”问题，从“史理”“地理”的观点说，大禹确有其人，古代亦确有洪水为患，大禹治水亦确有其事。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七十五周年，赴吉安讲演孙中山革命的功绩和学说。

一九四一年八月，名达改任研究部教授，对研究部资料的征集工作十分重视，亲手拟订计划，增加经费，扩大采访工作，规定研究部教授指导剪贴报纸，期刊论文，发动学生编写论文提要，分类合订，摘录报纸，编纂中外大事日记及索引，以供研究部教授、研究员及同学研究之用。

是时其母亲徐方琳、父亲姚舜生已先后下世，名达特于国立中正大学内设置“舜生、方琳史理学奖金”，除以父亲所遗房产捐作基金外，自一九四二年二月起，按月捐赠名达自己薪金的百分之十为奖金，受奖名额每年暂定四名，每名一百元，对象限于文法学院文史系学生，以各科成绩平均最优者为合格标准。奖金每年分两次发给，于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內交付受奖学生。并设置奖金委员会(委员七人)，管理奖学金的保管和发放问题。

名达为了阐发史理学与地理学的理论，特自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七日起，假得《民国日报》第一版园地，创办《史理与地理》

专刊，每两周发刊一期。第一期名达撰有《约束与期待》发刊词，除阐明本刊的意义和使命外，并发布了一篇独具见解的《史理释义》的短文说：“如须从根本挽救失败的史地教育，必须更改定名，首先揭起“史理”的名义，再行纠正地理的内容，并注重史地原理的探讨，推进史地两科进入科学的领域，然后才能提高史地两科的地位，增加史地两科的效用。”又说：“历史”一词，源自日本。史字本是书写文字的专家，南北朝以后，始用为史书之名。近世则移以指人类政事的本身。史理是史事的原理，人类的活动是事，人事在空间发生波涛，在时间发生影响，便是史事。史事的发展自有一定的原理存在，探讨史事原理的科学便是史理学。它和物理学、生理学、数学、心理学一样，都是追求真理的科学。只要我们肯努力研究，不愁不促进它和那些科学并驾齐驱，向前发展。”

名达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，也曾进行分析。四月十六日，他发表一篇《论德日会师印度不可能》的文章，说：“日本如梦想到印度拜见他的强盗伙伴，那只好永远在梦中享受他的甜蜜吧！一句话，决不可能。”不久，果如名达所预言，日本侵略军不敢进攻印度，却于六月初旬，妄图打通中国浙赣、粤汉两条铁路线，窜扰浙江金华、衢州，江西玉山、上饶一带。江西战时的省会——泰和，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六月十日，名达目睹达官贵人贪生怕死，感到十分气愤。为了动员民众，激励士气，联合同学数人发起组织抗日服务团。当时许多学生在他的感召下，纷起响应。团的建立深得校长胡光驊鼎力赞助，遂定名为“国立中正大学战地服务团”名达被推为团长。二十二日，名达团长率领全体团员全副戎装，乘火轮出发抵达吉安，吉安各界联合举行欢迎大会，会上致词的有王造时，彭文应、许啸天等知名人士。名达也在会上慷慨陈词。他说：“词人辛弃疾，诗人陆游等都是书生，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有他们的一定地

立，并且都是抗敌爱国的将士。”最后他大声疾呼：“前方士兵困守赣江，天地为屋，云雾为衣，枪林弹雨，伤病无医。凡我中华有志之士，必须克尽自己抗日救亡的天职，到前线去！到战壕中去！做一个中华民族的好儿女！”说得声泪俱下，感人至深。

嗣后连日里，名达团长率领战地服务团团员深入新淦，樟树前线，抢救伤病员。七月七日，是抗战五周年纪念日。傍晚，名达率领部分团员到达新淦石口村农民家里。当晚，三百多敌人由清江阳湖窜到永泰，另一百多人，由永泰窜到距新淦县城十五华里的石口村，把战地服务团团员围困住。日本兵用手枪逼住名达，名达抓住他握枪的手进行搏斗，团员吴昌达，郑唯龙也奋力相助，卡紧日本兵的咽喉，在颈上还狠狠地咬了一口，日本兵发出了几声惨叫便死去了。三个日本兵见状惊惶失措，瞄准了姚名达他们，并用手电照射在搏斗人的身上。名达夺得死去日本兵的枪跳起来喊道：“会开枪的同我来！”吴昌达紧跟在后面，“砰！砰！”日本兵开枪了，英勇的战士吴昌达便倒在血泊中。名达直往楼上跑，郑唯龙紧跟了上去，正准备接枪的刹那间，一个日本兵凶狠地对名达开了一枪，名达便立即倒在地下。同时，郑唯龙也被日本兵反绑了起来。名达还在地上挣扎，高呼“中华民族万岁！”“最后的胜利属于我们！”一个日本兵跑上去，对准名达的胸膛，一刺刀刺下去，名达鲜血直流，身子抽动了几下，光荣地贡献了自己宝贵的生命，终年三十八岁。

综观名达的一生，是与外患相始终的一生。出生之年，正值日俄战争于我国东北；后经“一二八”乃至八年浴血抗战。是一位民族气节高尚、英勇爱国的战士。名达的一生，也是勇于著述的一生，无日不与典籍为伍，无日不以著述为生，是一位为史学而努力的坚强战士。为了纪念他，全校师生特发起组织“显微学社”，编印《显微周刊》，使这样一位值得纪念的人物，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。